

龚景瀚《离骚笺》的成书与学术成就

徐瑛子, 周建忠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 龚景瀚是乾嘉时期有代表性的学者, 深受清代朴学之风影响, 力主考据求实。《离骚笺》为龚景瀚的《楚辞》研究专著。在乾嘉时期众多《楚辞》研究中, 《离骚笺》总体平和稳妥, 旨在疏通文脉大义、于训诂考证方面亦多有疏补, 虽有缺失之处, 但力求屈原本真, 展现了乾嘉时风及个人学术趣尚, 是清代《楚辞》研究史上不容忽视的著作。

[关键词] 《离骚笺》; 龚景瀚; 《楚辞》; 清代楚辞学

[中图分类号] I 207. 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2-0105-06

一、龚景瀚生平及《离骚笺》成书

龚景瀚“丁乾嘉朴学昌明之会, 又具学识著述之才”^[1], 为乾嘉时期有代表性的官员、文人、学者, 其生平、家世、履历等均有较为翔实的史例可供论考。龚景瀚著述颇丰, 有《澹静斋全集》等传世,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藏本。

(一) 龚景瀚生平

明清时期, 福州龚氏家族文风昌盛, 时人称福州龚氏“以循良显名天下”, 出现过龚嵘、龚用卿、龚其裕、龚一发、龚景瀚、龚易图等著名文人、官员, 《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相关记载。龚氏后人重视保存、整理先辈著述, 龚式谷等人刊刻的《澹静斋全集》以及龚葆琛等纂修的《福州通贤龚氏支谱》是研究龚景瀚生平的重要史料。

据《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世系考》相关记载, 龚景瀚为龚一发次子, 龚氏家族第十五世孙。龚一发(1715—1773), 原名关渭, 字天礪、号厚斋, 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乾隆庚午(1750)举人, 历任宜阳、林县、虞城等地知县。龚一发在任职期间, 兴修水利、创建书

院、与民共劳作, 后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龚一发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祀河南虞城县名宦祠。^{[2]27-35}

龚景瀚(1747—1802), 字惟广, 号海峰, 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 卒于嘉庆七年(1802)。龚景瀚为乾隆辛卯(1771)进士, 初任甘肃靖远知县, 后因功升擢, 历任循化厅同知、陕西邠州知州、庆阳知府、兰州知府等职。嘉庆七年送部引见, 卒于京师, 祀甘肃兰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乡贤祠。^{[2]36-45}

龚景瀚在军事、政治、治学、创作等方面都颇有声名: 作为文人, 龚景瀚著有《澹静斋文钞》《澹静斋诗钞》等, 现存诗400余首、文近百篇; 作为学者, 龚氏治学严谨, 深思力求, 其《祭礼考》《说裸》论述典章礼仪, 《鲁都考》《春秋大夫赐号说》考证求实; 作为官员, 龚景瀚为官任职期间, 兴修水利、整饬书院、讲学垂范, 使民能享其利, 因政绩斐然, 龚氏受总督福康安、总督宜绵器重; 除担任地方官职, 龚氏多年随军征战, 军事能力突出, 其《坚壁清野议》被编入《皇清文颖》。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称赞龚氏为“闽中近代诗家, 足以雄视海内者”^{[3]248}, 为官则“洞民情, 谙军事, 今之循吏而兼名将者也”^{[3]334}。

[收稿日期] 2018-1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2)

[作者简介] 徐瑛子(1994—), 女, 湖北黄冈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楚辞学研究。
周建忠(1955—), 男, 江苏靖江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楚辞学研究。

清人谢章铤评价龚景瀚玄孙龚易图时,将龚氏家族二人并论,“昔,兰州历官(龚景瀚)精通兵谋,公(龚易图)亦以书生杀贼。兰州所著‘澹静斋’诸书,内传诵,公亦撰《谷盈子》并诗稿十六集。后先相望,非所谓克绳祖武者耶?”^[4]³³⁻³⁴

(二) 龚景瀚著述考

龚景瀚勤于创作、著述颇丰,其作品涉及经史诗文等方面。据《民国闽侯县志》,龚景瀚所著有“《邶风说》二卷、《祭仪考》四卷、《禘祫考》一卷、《说裸》一卷、《孔志》三卷、《循化厅志》八卷、《读书访古录》、《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离骚笺》二卷、《澹静斋文钞》六卷、《澹静斋文钞外篇》二卷、《澹静斋诗钞》六卷。”^[5]¹³此外,《清史稿》《射鹰楼诗话》《经学博采录》《晚晴谿诗汇》等更为详细地记载了龚氏著作的刊刻情况,“有《邶风说》三卷、《祭仪考》四卷、《说裸》二卷、《离骚笺》二卷、《循化厅志稿》八卷、《澹静斋文集》八卷、《诗钞》六卷皆所手定;其属稿而未能成书者,《孔志》《禘祫考》《读书录》共若干卷,藏于家,皆说经者之圭臬也。”^[6]⁶

据前文所述以及《福州通贤龚氏支谱》等关于龚景瀚作品的相关记载,笔者兹分别考述如下:

《澹静斋全集》。该书有道光六年(1826)本、道光二十年(1840)本、同治八年(1869)本等版本,包括龚氏诗文集《澹静斋文钞》《澹静斋文钞外篇》《澹静斋诗钞》以及学术著作《说裸》《邶风说》《祭仪考》《离骚笺》。其中,《澹静斋文钞》六卷,收录有杂著、书信、序跋等;《澹静斋文钞外篇》二卷,多为与时事相关的政论文章;《澹静斋诗钞》六卷,有诗400余首,风格多样;《祭仪考》四卷,详述礼制,引用《诗经》《春秋》等证之;《说裸》二卷,阐释古代祭祀礼仪,并图文结合展示古代礼器;《邶风说》二卷、《离骚笺》二卷,二者分别为龚氏研读《诗经》、注疏《楚辞》之书。

《循化厅志稿》。八卷,龚景瀚任职循化厅同知期间编撰,李本源校订,该书涉及循化建制沿革、政治经济、民俗物产等方面。

《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史部·金石类》记载,“《石塔碑刻记》一卷,清林乔荫撰,《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清龚景瀚撰,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7]

《孔志》四卷。龚景瀚撰,林昌彝补编,现存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龚氏有感于前人对“孔子生卒月日,籍里宦游”的理解或博而多误、或未能辨正,故而广采群书,撰写《孔志》进行考证。

《积石山房四书文》。该书未见,据《澹静斋文钞》中《积石山房四书文自叙》一文可推知,是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有80余篇,因龚景瀚“望积石山,嶙峋峭拔,苍翠扑人”^[8]而得名。

另:《禘祫考》《读书录》等书为稿本,未进行刊刻,已不可考。

(三) 《离骚笺》的成书及体例

《离骚笺》为龚景瀚的《楚辞》研究专著,是书二卷,专疏《离骚》一篇,“笺其大义脉络,井然如丝连而绳贯也。”^[9]⁴⁰¹

乾隆三十六年(1771),龚景瀚登进士第、以知县归部铨选,后丁忧返乡。龚氏居乡十余年中,读书治学、教授学生;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龚氏赴选,授靖远知县。乾隆四十三年(1778),龚景瀚于永定书院主讲,闲时读《毛诗》《楚辞》数月,因而作《邶风说》解说《诗经》十五国风之《邶风》。其时,龚景瀚亦于《楚辞·离骚》一篇颇有所得,然“因循未及笔之于书”;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龚氏于公务之余,教导家中晚辈。因而龚氏集王、洪、朱三家之注,并加以补正,作《离骚笺》于泾阳官署。据《离骚笺·自叙》,龚氏记作书时间为“阙逢摄提格壮月望后四日”^[9]⁴⁰¹,“阙逢摄提格”为甲寅年,故《离骚笺》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九。

在编纂体例上,《离骚笺》首为龚景瀚《离骚笺·自叙》,说明作书缘由,次为正文,最后为总结性质的通论。《离骚笺》采辑众说,注疏《离骚》时先于原文文句下选引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之注解,又别引《说文》《玉篇》等书以及五臣、吴仁杰、邵瑛诸家之说进行补充。龚氏“瀚按”“瀚曰”常在上述注解之末,作进一步诠释考订。《离骚笺》多数释语为龚氏参酌几家之注而得,亦有少数文句,龚氏不列前人之

注,只用“瀚曰”“瀚按”的评语进行批注。龚景瀚认为前人注《离骚》,“皆随文训诂,未能贯通其意义”^{[9]401}。因不满前代注家未疏通《离骚》大义,龚景瀚分《离骚》为三大节、十三小节,《离骚笺》卷一为龚氏划分的《离骚》第一节,卷二为第二、三节及龚氏所撰总论。在分节的基础上,龚氏于句末或各节末归纳旨意、阐释章法,卷末总论考析作时、梳理脉络、评析文法。

二、训诂:字词训释,驳旧立新

“《楚辞》以王叔师《章句》为最古,至洪氏《补注》、朱子《集注》而备矣。”^{[9]401}龚景瀚治学深受乾嘉学风影响,龚氏注《骚》虽旨在“贯通”《离骚》大义,然龚氏治学深受时风影响,《离骚笺》在训诂方面同样采辑众说、间出新意。具体言之,《离骚笺》释词解句既重视探究本义、亦结合语境,考辨名物则广征博引加以论断。

(一) 探求本义,征之典籍

《离骚笺》训释字词时综合旧注并进行补说。龚景瀚常据《说文》《玉篇》等书探求本义,进而援引古籍中相关字词以证之。

1. “何桀纣之猖披兮。”龚氏首引王逸注及五臣注,而后注云:“按《玉篇广韵》,衣不带之褱皆从衣,今此从犬,似当从猖狂本义。五臣说近之。”^{[9]411}关于“猖”,王逸释为衣不带之貌,五臣释为“乱”;龚景瀚引《玉篇》,从字形出发分析字义,衣不带之“褱”形旁从“衣”,而“猖”形旁从犬、读音从昌,本义指纵思狂妄,更切合《离骚》文句中的意思,龚氏因此认同五臣之注。

2.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龚氏注云:“《玉篇》‘謇’,居展切,难也,吃也。朱说为本义;王训为‘忠贞’,则转义也,兼之始备。”^{[9]412}朱熹释“謇”为“难于言”,王逸释为“忠贞之貌”,龚景瀚据《玉篇》等字书,指出朱、王之说一为本义、一为引申义,训释时应当兼顾二者。

3. “又重之以修能。”龚氏注云:“修,《说文》曰‘饰也’;《玉篇》曰‘治也’。其义当与《大学》‘修身’同,训为修饰、修治俱可,

下文‘修名’、‘好修’皆因此。王训为‘远’,朱训为‘长’,俱非。”^{[9]404}龚景瀚引《说文》《玉篇》,又引《大学》之“修身”作为佐证,认为“修”为修饰、修治之意,后文“修名”“好修”“灵修”等均同为此义。而后,龚景瀚结合“好修”解释“灵修”,注“夫惟灵修之故也”云,“修为修治、修饰,训‘远’非也。在君为灵修,在臣为好修,其义一耳。朱为妇悦其夫之称,亦未必然。”^{[9]413}

(二) 据境索义,审慎通达

释词解句为训诂的基本内容,龚景瀚不仅基于《说文》《玉篇》等字书探究本义,又立足于更宽的语言环境,结合上下文疏通文句、串讲评析,其注疏总体较为平实审慎。

1. “及荣华之未落兮。”《离骚》之“荣华”,历代注解有指颜貌、指草木、屈原自喻等义,如王逸认为“荣华”寓指颜色、荣华未落指颜貌未老。龚景瀚结合语境,上文言琼枝,下文有荣华,“荣华,指琼枝,非指女”^{[9]443},因此释荣华未落为草木繁盛之貌。

2. “告余以吉故。”龚氏注云:“故者,已然之蹟也,下文传说吕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吉善者也。”^{[9]454}前人多释《离骚》之“吉故”为求合之吉占,王邦采释“吉故”为“会下文之意以立言”^{[10]583},龚景瀚之注与王邦采类似、而更为详细,后文吕望、宁戚等均为君臣遇合之范例,因此“吉故”所指为前事吉善者。

3. “又何芳之能祗。”王逸、汪瑗等注“祗”为敬,子兰之徒干进务人、不能敬爱贤人。黄文焕训“祗”为振,“何芳能祗”指自振其芳^{[10]631};龚景瀚指出:“何芳能祗,言不能敬以自保也。王说非。”^{[9]458}

(三) 着意草木,补证地理

“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11]循名责实、辨别异称,从语源上追本溯源是名物研究基本方法之一。《离骚笺》于名物考辨颇下功夫,龚景瀚或辨析植物、或考证地名,在旧注基础上提出质疑、补正疏误。

1. “夕揽洲之宿莽。”王逸认为“宿莽”指“草冬生不死者”,吴仁杰引《山海经》,注“宿莽”为莽草。^{[10]397}龚景瀚注“宿莽”云:“王注必有所本,且此云‘宿莽’,《山海经》曰‘莽草’,

未必一物”^{[9]407}, 龚氏认为王逸之说必有所根据, 吴仁杰以“莽草”释“宿莽”, 失之穿凿。

2. “杂申椒与菌桂兮。”龚景瀚注“菌桂”云:“吴以蕙与熏草为二物, 是也。其说互见, 下句以菌桂为二物, 亦有据。但在本文, 以‘申椒’例之, 似指如竹之桂。且此句皆言香木, 不应杂以草。从竹、从草, 或古字通用, 或传写之误, 不宜泥也。”^{[9]409}龚氏在吴仁杰注疏基础上, 据对文索义, 以“申椒”之例推断“菌桂”为木名而非草名, 并从字形变化、文本流传的角度进行推测, 加以佐证。

3. “留有虞之二姚。”龚景瀚考证此句所提及地名的具体位置及名称。龚氏承袭杜预之说、指出洪兴祖之误, 将《离骚》中“有虞”释为河南虞城, “今河南归德府虞城县, 古之纶城也。河东之虞城, 乃舜初起之地, 非此虞。洪引皇甫诸说, 非是。”^{[9]446-447}

《离骚》篇章宏富, 其中不少名物难以考索, 如无确证, 龚景瀚秉慎言阙疑之义, 不强为之说。如“索胡绳之纚纚”, 吴仁杰注“胡绳”为大蒜, 龚景瀚指出吴说之谬误, 又云:“以大蒜为香草, 似非也。绳毒之名亦不见于古, 吴说似附会。以上文薛荔例之, 胡绳当是一物, 但不可考耳。”^{[9]418}

三、文法: 划分层次, 剖章析句

“箴之为言, 线也, 不多之谓也。读者之悟, 与作者之意相遇于幽玄恍惚之地, 一线孤引, 竟欲忘言。其文反略于作者, 而以作者为我注脚, 此为上上人语也。”^[12]《离骚箴》亦以“箴”命名, 龚景瀚立足《离骚》文本, 用“箴”之体例通义理、述章法, 力求达到全文大义“丝连而绳贯”的注疏效果。

(一) 评析结构, 讲求脉絡

历来学者对《离骚》段落的划分看法不一。王邦采《离骚汇订》以三分法划分《离骚》层次, 以卷首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 第二段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而后为第三段。龚景瀚同样以三分法为中心进行层次评析, 总体分《离骚》为三大节、又细分为十三小节, 并认为“乱曰”数句为全篇大旨所在。《离骚

箴》之三大节分别为: “自篇首至‘沾余襟之浪浪’为首一大节, 皆言‘国无人莫我知’也……自‘跪敷衽以陈词’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中一大节, 皆言‘莫足与为美政’也……自‘索蔓茅以筵蓐’至篇末为一大节, 皆言‘何怀乎故都’, 而‘将从彭咸之所居’也。”^{[9]469-471}

龚景瀚言: “求女一节, 王注为近, 近李厚庵申之, 其说始畅然”^{[9]449}, 其《离骚》分节之说或是由李光地《离骚经注》中“两段说”发展而来。李光地称《离骚》前半篇直述己事、后半篇托意寓言。龚景瀚则更进一步, 分《离骚》为无人知己、上征求索、问占远逝三大部分, 并于各段小节以及篇末总论等处反复申说屈原忧君忧国之意, 以《史记》之“眷顾楚国, 系心怀王”贯穿全篇。龚景瀚释《离骚》之“见帝”“求女”为“无聊之思, 作万有一然之想”^{[9]441}, “见帝”一节言屈原多方悟主、小人多方败之; “求女”一节因王逸、李光地之说敷衍, 龚氏又言求女比求贤臣、春官喻指嗣君, 宓妃指有贤名而不忧君国者, 简狄、二姚指他邦之贤。

在三分法的基础上, 龚景瀚析分篇段, 点评《离骚》之章句文法以及各大节、小节之间的关联, 总结照应、伏笔、承接等艺术手法。龚氏解三大节之间关联, 如篇首“高阳苗裔”二句有宁死不可去国之意, 正与篇末临睨旧乡、诘然而止呈首尾呼应之势。龚氏亦解各小节之起伏照应, 如“固前圣之所厚”为“节中前圣”一节伏笔, “启九辩与九歌”一段文法与“说操筑于傅岩”遥遥相对。龚氏举芳草与玉饰为例解说“脱卸”之法, 前半篇取喻于芳草, 至众芳芜秽、则兼取芳草与玉言之, 至兰芷不芳、则单言兹佩可贵, 以此展现《离骚》之层层递进、起伏照应。

(二) 剖析心态, 考析作时

龚景瀚注《骚》旨在推究篇章脉络、体贴屈原本心, 其《离骚箴》于揭示屈原心迹、考析《离骚》作时等体察入微、又申以己说, 有新颖可采之处。

在注疏过程中, 龚景瀚设身处地、揣摩心态, 紧扣“生死”“去留”的线索勾连《离骚》全篇, 指出“不可去而必死之意”为一篇之筋

节:于开篇二句,龚氏言溯所自出,已有宁死不可去国之意;于“恐皇舆之败绩”句,龚氏言此为君国、非关一身,是故国不可去;于“怀朕情而不发兮”句,龚氏言宗社将墟,不有君国、何有一身,故必当死也;篇末,龚氏言为国无望、不可去亦不可留,其必死之意隐然言外,并非徒为君不我用、俗不我知而自沉。除反复推求关键词句,龚景瀚从全篇综合把握屈原心态。龚氏举前半篇“九死”“溘死”“死直”“危死”等处,云:《离骚》前半篇“多必死之言,而非有必死之志,皆以甚言己节之不可变”;至见帝、求女均不可为,其时死志已决、哀痛已极、而后半篇无一言及死,“所谓哀之至者不言其哀”“忧之至者反若无忧”^{[9]473}。

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历来注家以《离骚》为屈原初放之作,龚景瀚立足文本、揣摩心态,复考析《离骚》作时。龚氏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未立之时,“游春宫”处即深有望于顷襄,因怀王此时已留于秦。而后,龚景瀚结合屈原之生死去留及《离骚》脉络词气,分析《史记》“嫉党人”“怨其君”“忧其国”之情,指出《离骚》前半篇词气激烈、多有怨愤,因怨时犹有所望;后半篇宗社之亡在于旦夕,屈原只期一死,故文辞益见深沉,从而以《史记》为证、确定《离骚》作时。

四、义理:以《诗》解《骚》,阐发忠孝

在注疏《楚辞》的过程中,龚景瀚结合研究经学著作的心得与方法,其《离骚笺》重视寄托、以《诗》证《骚》,并糅合“忠孝”解读《离骚》文意及主旨,显露出伦理纲常的倾向,体现了龚氏自身学术趣尚与价值判断。

(一)《诗》《骚》参互,比附对照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13]以《诗》解《骚》之风发轫于刘安《离骚传》,王逸亦称《离骚》依《诗》取兴、依托《五经》立意,此后注家引儒家经典解《骚》、尤其引《诗》解《骚》者代不乏人。

受其时经学风气影响,清代以经解《骚》

之风颇盛,如奚禄诒《楚辞详解》引《易经》《礼经》证《骚》,挖掘其哲学内涵、文化意义。龚景瀚“出入群经,贯穿礼制”,常以经学作为立足点阐发文学作品,其《离骚笺》是乾嘉时期《楚辞》研究中以《诗》解《骚》的典型。

《离骚笺》分《离骚》为三大节,龚景瀚称三节正如《诗经》“赋比兴”之义,并认为结尾“乱曰”如《诗》之小序。具体言之,龚氏《离骚笺》之分节首一大节言“国无人莫我知”,龚氏云:“此一大节正言之也,时人所谓赋也”;第二大节言“莫足与为美政”,龚氏云:“此一大节放言之也,时人所谓比也”;第三大节言“何怀乎故都”,龚氏云:“此一大节假言之也,时人所谓兴也”。^{[9]469-471}龚景瀚以其治《诗》《礼》的学术优长阐释《楚辞》,形成了自身特色。《离骚笺》划分《离骚》为三大节,又以结尾“乱曰”总结全诗大旨,显得结构紧凑、层次井然;然龚氏强行比附《诗经》,将“赋比兴”与《离骚》三大节分别对应,以“正言”“放言”“假言”进行概括,又将“乱曰”与《诗》之“小序”等同的做法则臆测过度,难免扞格。

另外,龚景瀚研究《诗经》的同时又兼治《楚辞》,《邶风说》与《离骚笺》分别为龚氏的代表作。《离骚笺》借“赋比兴”划分段落,《邶风说》则结合《离骚》意蕴阐发《诗经》之微言大义。^{[14]18-22}其中《柏舟》《静女》二篇《诗》《骚》参互的特点较为鲜明,以《邶风说·柏舟》为例,龚景瀚将《离骚》与《柏舟》对照,称二诗主旨相通;龚氏又道:《离骚》“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句即《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意。^{[14]2-5}《离骚笺》展示了龚氏以《诗》解《骚》的研究方法及经学的精神指导,而《邶风说》中,《诗》《骚》的交互是相互的,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柏舟》以“隐忧”为主线,诗中因群小构陷而报负难申之忧愤与《离骚》中忧郁苦闷、生不逢时之哀确有相通之处,龚景瀚之解说有其价值所在,然进行比附,则有过度阐释之嫌。

(二)君臣之义,忠孝之旨

明末王夫之、黄文焕等借注《骚》寄托心志,多有激愤之言、怨君之语。清初,李光地、

方苞、刘献廷等学者通过注《骚》宣扬性理之学，屈原的一系列行动从而被推崇为遵循理学的圣贤之举。至乾嘉时期，政治高压加大、文网严密，江中时、林仲懿、梅冲等学者接受并宣扬《楚辞》君臣大义、忠孝伦理之论。

《离骚笺》开篇，龚景瀚即提出“忠孝”，注“正则”“灵均”云：“父名而字之，所以期之者如此，使困于谗佞而改易，非独不忠，亦不孝矣。”^{[9]404}而后，龚氏反复申述屈原深有望于君，上下求索只为悟君、求贤；屈原之不得志是小人、党人之过，《离骚》不怨其君、处处归咎于世，正显忠厚之义，“君不悟者、党人为之”^{[9]414}，“己多方悟主、小人多方败之”。又，李光地《离骚正义》、刘献廷《离骚经讲录》是清代前期流传甚广的《楚辞》注本，提出“陈古义、剖治道”“忠孝为宗”诸说，后代学人治《骚》受影响者不在少数。龚景瀚受其沾溉颇深，《离骚笺》在分段、主旨等方面或援引、或借鉴二人之书，故龚氏注疏《离骚》时亦常有“君心”“君臣”“忠孝”之言。

此外，龚景瀚以忠孝之说、忠奸之辨为立足点，将《离骚》某些文句一一坐实对应、挖掘其象征意义，如“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诸句，龚氏云“其党盛矣。总总离合，陆离上下，变幻诡诈不可测度也。谗谄蔽明，而君听因之不聪”^{[9]442}，释写景之句而糅合义理的色彩，明显失之于穿凿附会。

[参考文献]

- [1] 张维. 陇右方志录 [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第77册. 兰州: 兰州古籍书店, 1990: 5.
- [2] 龚葆琛. 福州通贤龚氏支谱 [M]. 清光绪九年本.
- [3] 林昌彝. 射鹰楼诗话 [M]. 王镇远, 林虞生,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4] 谢章铤. 赌棋山庄文又续集: 卷一 [M]. 清光绪十八年本.
- [5] 欧阳英, 陈衍. 民国闽侯县志: 卷四十七 [M]. 民国二十二年本.
- [6] 桂文灿. 经学博采录: 卷三 [M]. 民国三十一年敬跻堂丛书本.
- [7]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史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485.
- [8] 龚景瀚. 澹静斋文钞 [M]. 清同治八年本.
- [9] 龚景瀚. 离骚笺 [M] //黄灵庚. 楚辞文献丛刊: 第63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 [10] 崔富章, 李大明. 楚辞集校集释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1]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 陈玉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57.
- [12] 李陈玉. 楚词笺注 [M] //黄灵庚. 楚辞文献丛刊: 第39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1.
- [13] 洪兴祖. 楚辞补注 [M]. 白化文,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
- [14] 龚景瀚. 邨风说 [M]. 清道光六年本.

On the Comple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Gong Jinghan's Li Sao Jian

XU Ying-zi, ZHOU Jian-zhong

(Research Centre of Chu Ci,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Gong Jinghan is a representative scholar during in the Qing Dynasty.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tyle of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and systematically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The Book of Rites and The Songs of the South. Li Sao Jian is his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work. In this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works related to Chu Ci, Li Sao Jian is generally stable as well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verse, study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verifying object things and explaining the basics. Although this book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e strength of this book is the pursuit of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author and the work. This book shows the social atmosphere, academic atmospher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Gong Jinghan's own academic choices. It is a work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Gong Jinghan; Li Sao Jian; Chu Ci;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h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林 芎)